臺大歷史學報第 23 期
1999 年 6 月，頁 411-444

BIBLID1012-8514(1999)23p.411-444

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爲例之探討*

曾 華 璧**

提 要

本文所指的「環境史」，是指在當代環境主義思潮之影響下，利用「生態學」的新知，解釋歷史文獻，試圖重建人類的行為和自然環境互動關係的新史學。本文先由學術變遷史的角度，探討環境史的內涵，並將分析美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階段，闡論此一新史學領域崛起之因素，論證它具有創造與轉化、跨領域，和當代性等特質；並以美國為例，證明其學術地位的穩固，已到了不容國內學界輕忽的地步。論文將歸納該領域的重要研究理論和著作，並進一步闡論史學研究對當代環境議題的貢獻與意義，及其所面臨的困境。最後對進行環境史研究的預備條件，和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提供觀點和討論。

關鍵詞：環境史　美國史學　環境主義

---

* 本文初稿在 1999 年 2 月 19 日，哈佛大學燕京訪問學人的小型研究會上發表；兩岸學人—陳昭瑛、張珣、黃萬盛、王建民、李天剛、阮煒和林宏星等學者（分屬哲學、人類學、史學和文化研究等領域），感謝他們參與討論，並對書寫型式，提供寶貴意見和鼓勵，特此誌謝。惟整體之架構和思考，仍以作者自 1980 年代末期以來的自我研讀，以及 1998 年 9 月獲國科會第三十六屆出國進修獎助，前來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後，全面針對此一問題的審視和分析，爲本文撰寫之依據，因此若有思慮不周，論點不盡完善之處，皆由作者自負其責。

** 作者現任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環境史的定義及研究的方向
三、環境史興起的原因和各發展階段的意義
四、環境史研究的困境：兼論迷思
五、新方向的形成與未來的發展：代結語

一、前　言

「環境保護」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末期，人們最熟悉的一個辭彙。在西方的史學研究中，有一支新興領域，我稱之爲「當代環境史」（以下或簡稱環境史），發展至今，已有三十年左右的時間。[1]但台灣學術界對其內涵，並非十分熟悉，或者直覺上認爲和傳統史學研究不相符合，而對所謂的「環境與歷史研究」之關係存疑。對西方近代史學發展熟悉的人，對於此一情況，必然觀察到興起於1960年代之後，而今活躍於學術領域的「女性研究」，在發展之初，也有類似今日環境史領域的相同處境。孔夫子曰：「三十而立」；今日環境史「三十年來」的研究成績，不僅燦然可觀，在西方學術界更是一個受到重視和肯定的領域；國際的環境史研究成果，在英國和法國都有相當好的成績。英國的研究，被認爲比較偏重其本土事例的探討，因此成果較少能夠應用於解釋世界的相同議題；法國的研究，則比較注重宏觀面的探討。但無論各國的研究焦點有何不同，本質上「環境史」所具有的國際性格，已是一個被肯定的事實了。（Worster, 1982）而且根據我對北美環境史發展的分析，發現它的研究方向，已有新的演進。因此「對此一新興的學術領

1 《環境歷史》期刊認爲當代環境史領域，興起於1960年末，1970年代初。（Miller & Rothman, 1997:xiii）此處所稱年數之計算，是根據美國環境史領域的創始人John Opie於1968年起，就展開利用生態學觀念，處理人與環境關係的歷史爲依據，故以此做爲美國環境史的起始年。但是就歷史的發展而言，美國史家認爲自然環境和美國社會的關係，受到重視和研究，已經有百餘年之久了。（Richard White,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 Review* 54, no.3 (1985): 297.）本文依據當代環境史的特性，採用Opie的研究時間作爲推算的起點，而稱該領域有三十年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域，賦予關懷，建立認知」，相信是必要的。

本文的目的，希望對此領域的內涵和特色，略加介紹，並進一步察考其興起的原因、學術發展的階段和意義，並探討新發展的方向。所探究的問題，包括：何謂「環境史」？它和傳統史學研究有什麼關係或差異？爲何興起？它的研究方向和理論依據是什麼？本文將以這些問題爲本，先行對該領域的內涵，進行分析和討論。本文的第二部份，將對該領域的興起和分期，提出個人的論點，並將論述此一領域發展的意義與迷思。最後對環境史的發展趨勢和猶待處理的問題，提出我的個人的觀察和思考，以作爲本文的結語。本文爲了證明「當代環境史」已是一個「成年」的學術領域，所援引的論證資料，將以美國環境史學的發展歷程爲例證；原因有二：一、今日史學界對「當代環境史」的定義和研究方向的規範，幾乎都不脫離美國環境史家的觀點；二、美國環境史家在理論的建構和議題的開拓上，啓發和貢獻最多。故本文利用自1976年發行至1998年止，歷經三次改名，而今稱爲《環境歷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期刊文獻，佐以重要環境史家之論著，並且參酌相關論文，以作爲論述和分析之主要依據。

學者或許會由本文之論述，發現以往中國歷史地理學派的研究，近似於今日的環境史，例如採用氣候變遷論，闡述其與遊牧民族南遷的關係，或是探討黃河的災變問題等；本文作者並不拘泥於某種定義，而認定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和今日的環境史研究無關，但因本文之主旨，僅在於證明「環境史」學門存在的事實與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對於上述學派和環境史研究的關係，以及「中國與台灣環境史學術發展歷程」，及世界各國的環境史成果等議題，都將暫時旁置，未來另文探討。[2]

2 中國學者如復旦大學歷史系之譚其驤（人口與環境）、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史念海（黃河史）、浙江大學竺可楨（氣象學），以及北大地理系侯仁之等的研究，甚受稱許，都可另文探討。我中研院學人蕭璠，長期致力於中國農業史研究，是北美環境史研究極爲重視的環境課題；劉翠溶院士先後完成數篇環境與聚落之研究，並和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合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中研院經濟所，1995年）。這些都是台灣目前環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對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著墨不少，是讀者重要的參考和入門之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環境史的定義及研究的方向

（一）定義

「何謂環境史」？質言之，就是由生態學的知識基礎，探討在歷史時間的架構下，人類行爲和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與變遷。故環境史家在界定其研究內容時，都認爲它不僅討論人類本身的問題，還探討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Bailes, 1982: 5)傳統史學一向側重經濟、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之研究，也常受時代因素影響，轉換研究議題。以十九世紀爲例，「民族國家」和「國會政治」是歷史研究的主題，這與當時「民族國家」之形成的政治發展趨勢，有密切的關係，故吸引史家的專注。但是興起於1970年代的環境史，則是受到當代環境運動發展的影響，而將研究的對象，轉至傳統史學未曾觸及的層面—「地球和它的生態系」，並將它和人類活動的關係，作爲探討的主題。環境史家認爲將人類的行爲活動和自然環境因素相結合的歷史研究，就是一種利用「自然環境」的觀點，賦予歷史新的詮釋。環境史的整體內涵，可由二個部份加以分析：一、就範圍而言，環境史家試圖擴大傳統史學的研究範疇，使之超越階級、性別、種族等議題，進而深入地往下探索，直觸「地球」本身，以之作爲歷史研究的目標。因此研究的範圍，由前述十九世紀的國會機構和工業機制的運作等題材，轉移到以田野、森林與空氣爲對象。二、觀念上，揚棄傳統上「人類經驗與自然限制無關」的假設，基本觀點認爲：人類並非是超自然的神奇物種，因爲過去的行爲而造成的生態後果，已不容人類忽視。換言之，環境史家認爲，人類必須擺脫往昔的幼稚和無知，須要以「全球性」的生態觀，作爲人類行爲的指標依據。這種思考的具體實踐，就是環境史的研究架構的產生。

本質上，由於歷史研究型態的改變（亦即環境史的誕生），將使得人類未來擁有兩類歷史：一是屬於自己國家之史；另一則是人類共有的地球之史。（Worster, 1987: 90; 1989: 289～290）環境史家也說：「環境史提供人們一部以地球之眼，審視過去的史蹟，它的研究，是在時間的長河中，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討人類和自然互動的許多方式。」（Merchant, 1993: 1）在環境史研究上，我認爲有二個年份，最能說明以地球觀點思考的特色：一是1492年哥倫布登陸西印度群島和美洲新大陸；（Crosby, 1972）二爲1969年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Worster, 1987: 87～88）因爲這二大歷史事件，涉及了地球環境和觀念的變遷，所以特別值得注意。我十分同意Alfred W. Crosby將1492年，作爲當代人類環境變遷的重要關鍵年的觀點，因爲透過地理大發現運動，人類和其他物種的「跨洲交流」情形，日漸頻繁，這對生態系的變遷，產生極大的影響；而人類的太空探險運動，則使我們能夠跳脫地球本體，由太空中俯瞰藍綠色的地球之美，以致興起一套新的思考，例如1979年James Lovelock 提出「蓋婭（Gaia）：大地之母」的概念，主要就是受到人類探險太空的影響。

總之，環境史認爲：「自然」、「環境」、「生態」等觀點，是繼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和「國會」之後，成爲社會和學術界共同關心的主題；環境史宣稱：達爾文的理念，應該如同Adam Smith、Karl Marx、和Sigmund Freud等人對學術理論的深遠影響一樣，成爲學術團體普遍接受的工作準則。（Worster, 1984: 1）這就是環境史的學術宗旨。

至於名稱的使用上，大都以「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爲統稱。有人認爲：既然「環境史」研究和「自然」（nature）有密切的關係，爲何此一領域不稱爲「自然史」？針對此一名詞的選擇，許多環境史家都有討論。大致上，因爲「環境」一詞，常用於指稱「非人類」的自然界，因此它的範疇要比「自然」大，故美國史學界大都採用「環境史」，而不稱「自然史」。[3]但有時候，也會以「生態史」（ecological history）和「環境史」二詞，互換出現。（Merchant, 1993: 1）

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是，由於「環境史是一個跨領域的研究」，因此從

3 相關討論請詳見 Roderick Nas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1 (1972): 376; John Opie,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Review* 7 (1983 Spring):13; Donald Worster,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3 (1984): 16; Richard White,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4 (1985): 334～3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環境史研究，我認爲有二個最基本的條件：首先是要具備史學的基本訓練，並須兼有當代「生態學」的知識。因爲環境史討論的對象，包括「人」與「自然」兩個質素，而且人類的行爲層面廣泛，因此要討論二者的互動關係時，除了生態學之外，還涉及許多知識領域，例如：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倫理學、經濟和政治學等。（Worster, 1984: 1; 1988: 289～292）基於此一性質，美國的學界認爲和環境史相關的領域，計有：生態學、科學史、森林史、農業史、法律史、美國印第安人史等，（Merchant, 1993: viii）足見該領域的多面性。環境史領域創始人 John Opie 曾經提出一詞「charivari」，作爲新領域的形容詞，當時就連美國歷史學者都必須翻閱字典，察其含意。（Hughes, 1983: 3）「charivari」的意思是指婚禮上的狂歡，用以形容兼含不同學術方法的史學新領域之誕生，在今日看來，這仍然是一極爲貼切的用詞。

在此還要特別指出一點，在評定研究是否屬於「環境史」領域的思考上，我認爲最重要的質素，不是這個研究的時間，是古代時期或是當代議題的區別，而是在於它的研究，是否呈現歷史時間和變遷的意義。我以爲這是環境史研究，最須釐清的觀念。

（二）研究的範疇與方向

在明確界定環境史的研究範疇上，各家自有主張。本文根據時間順序，擬提出三種基本的、主要的依據，以供參考。

美國環境史學會對研究範疇的規範，是第一個重要的基點。該學會是由美國環境史學家 John Opie主導成立，它於1982年召開第一屆的全美環境史學術研討會時，將此研究領域，分爲四大項，包括：

⑴人類對自然之評價、態度之變遷，以及其意義之探討。

⑵人類經濟行爲對環境之影響，以及人類環境價值觀對經濟之影響。

⑶森林與水資源之保育（即資源保育運動），及環境運動之歷史。

⑷專業團體之角色——如科學家、工程師等之貢獻，及其與環境思想和運動之關係。（Bailes, 1985: 4）

第二個分類，當舉Donald Worster的研究範圍界定法。Worster在建立環境史研究領域上，是一位早期的推動者，有重要的貢獻，且他的觀點，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被引用。Worster將研究範圍劃分爲三類：

⑴針對自然環境本體的變遷的研究，亦即研究「自然本體在歷史上之組織結構及其功能」；

⑵人類經濟生產型態對自然環境衝擊與變遷的研究，亦即是研究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互動關係；

⑶人類對環境的價值、倫理與意識型態之研究，這是屬於與人類心智相關的諸如知覺、倫理、法律、神話，以及其他意義上的結構型態之研究，專注於個人或群體與「自然」之間的對話關係。（Worster, 1988: 294～303）

第三種分類法是由在環境史的發展上，扮演重要轉捩角色的環境史家William Cronon所提出，1990年在評論該領域的發展性時，提出雨傘論。他認爲環境史的大傘，涵蓋三個極不相同的分枝研究範疇：其一、探論某一特定的地區中，其特別的、但改變中的生態系內之人類社會的活動；其二、探究不同的文化中，有關人類和自然關係的信念；其三、關係環境政治和政策的研究。（Cronon, 1990: 1122～1131）

Cronon的分類，簡言之，就是區域生態系和人類社會互動的關係、文化系統的自然信仰、以及環境政治議題的研究。我認爲此一區分法的特點，是增益前述二個比較注重思想、社會和經濟的研究範疇，凸顯出事實上早已存在環境史研究中的「環境政治」議題。而且上述三類研究方向的討論，雖然各有區分與重點，事實上，它們是共同組成一個單一、且具有動力的探索目標，也就是將自然、社會和經濟組織、思想與慾望，以及政治等問題，化合成爲一個整體性的研究對象，而此一對象的整體變遷，被形塑成一個縱橫古今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的特殊研究題材。因此，環境史研究可以說是將一群有廣泛主題的研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思想、政治、地理與史學），結合而成的新領域，透過綜合的形式，以追求新問題和答案，而不是企圖建立一個新的、或是神秘和奧妙的專業研究。對作者而言，它已清晰的顯示出「創造和轉化」的特性。

分析美國環境史研究的內涵，可以發現該領域基本上是依循這三類的規劃，作爲學術發展之主要依據，而且成長的速度極快。在此擬以兩個例證，說明環境史成長的情形。第一、以1989年Donald Worster 的著作《天涯海角》(*The Ends of the Earth*) 所附的書目爲例，作爲證明。他在附錄中，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成果，分爲五個領域，分別列舉參考著作，該領域的內容包括：

1.Introduction to the Field（環境史領域導論）

2.Studies in Natural and Human Ecology（自然和人類生態研究）

3.Human Ecology（人類生態學）

4.World History i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環境史觀點的世界史）

5.Major Regions of the Earth（地球主要區域的環境史研究）

5-1. Europe（歐洲環境史）

5-2.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非洲和拉丁美洲環境史）

5-3. Asia and Pacific（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環境史）

5-4. North America（北美洲環境史）

上述書目，以北美洲環境史的成果最爲豐碩，但基本上，可以窺見環境史研究的各種面貌，其中還包括了國內學界十分熟稔的史學大師William H. McNeill的大作，McNeill在1979和1980年，分別出版與環境史有關的世界史著作：一是《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9；中文由楊玉齡翻譯，1998年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另一是《人類的狀況：一個生態觀點的考察》(*The Human Condition: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自Donald Worster出版該書至今，已有十二年，西方史學界在環境史的研究數量及觸角，更爲可觀和多元。讀者只要上學術網路探訪，任何一所美國大校的環境研究藏書，都是極爲豐碩。這種研究成績，已經不容我們輕忽了。

再者以代表美國環境史的專屬領域之期刊——《環境評論》（*Environmental Review*）的發展史爲例。先是，該刊創於1976年，1990年改名爲《環境歷史評論》（*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至1996年，《環境歷史評論》和《森林與資源保育史》(*Forest & Conservation History*)，正式合併，改名爲《環境歷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森林與資源保育史》是另一個環境史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期刊，由森林史學會(Forest History Society)主編。合刊時，主編Hal K. Rothman在〈編者言〉中提及：「我們希望這次的結合，能讓我們邁向新的境界，能夠完成各自作爲單獨的機構和期刊型態時，無法達成的目標，而且能夠在新刊上，營造令人驚歎的廣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深度和環境史領域的學術品質，並在學術界及其以外的地方，發揮巨大的影響力」。1997年2卷1期的〈編者言〉，更述及該刊物的會員和讀者的數量劇增。這個發展，證明美國環境史領域的成長，已是眾所週知。

（三）環境史研究的貢獻與困境

基本上我認爲環境史的的貢獻有三：一是以史學之長，提出對環境問題完整觀點的詮釋；二、史學的敘事文體，最能發揮對社會大眾的環境教育功能；三、將自然因素列入史學研究，拓展了史學研究的新可能。以下將就這幾個不同的層面，論述環境史研究的貢獻。

首先，史學方法在研究上，一向被認爲能夠提供整體性的觀點和意義，是史學的重要貢獻和特色。環境史研究極爲重要的意義，也正在於它能夠提供人類對環境變遷，有一個完整性的認識。在此特舉環境哲學家Joseph M. Petulla的肯定之詞，以作說明。他說：「以一個學術體系而論，史學在統整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和一般性的文化層面，以獲取通盤性了解變遷如何產生時，似乎困難最少。」（Petulla, 1977: 36）因此，布勞岱處理菲力普二世時代地中海區域的長期歷史之環境變遷，就深受Petulla稱許，並認爲這就是作爲史學表現其長處的證明，因爲Petulla認爲：對於地理變遷的區域歷史研究，能夠提供有關自然環境、資源利用、新舊社會團體與文化之關係等層面的各種觀點，有助於我們對問題的全面認知；布勞岱的研究法，正有此一功能。Petulla甚至在1976年，對美國環境史的研究成果，進行調查分析，結果發現：一個學者的研究方法，若是將影響環境變遷的各種因素，例如經濟、政治、社會、技術或文化等，各自孤立起來探討，則這些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分析法，無論是「生態—機械式」、「經驗—數學式」、隨意式或嚴格的「結構—功能式」等模式，結果都會因爲它使用了孤獨性的方法，以致使它的研究價值，變得有限了。因此Petulla論及環境研究的方法時，主張必須注意二個方向：一是由歷史發展的角度定義問題，另一個是選擇未來可以解決環境問題之可能方法。（Petulla, 1977: 37）這個論證，提供我們由哲學家的角度，肯定史學對環境研究的貢獻。

第二個貢獻是，史學的敘事文體，最能夠發揮大眾環境教育之功能。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論稱環境史研究的用處時，應該注意它的基本學術特色——亦即它傳承了史學的「敘述性文體」，而這種方法，在史學中，正是保留得比其他學門，更爲明顯和強烈的地方。我以爲這個特質，是史學作品和社會大眾對話時，能夠比其他大多數學術領域的作品，獲得更廣大青睞的原因。此一特色的發揮，相當受到Cronon的重視，（Cronon, 1993: 5）他曾論及「歷史智慧的呈現，是以寓言的型態，而非以政策建言或其他必然的形式」，正是史學的特色；（Cronon, 1993: 16～18）而他在其個人的著作中，常使用此一風格，結果也深得美國學術界的肯定。作者此刻正在哈佛大學進修，和紐英格蘭（New England）地區的一些環境研究的學者進行討論時，一再發現他們對Cronon使用史學敘述文體，和社會群眾交流的方式，贊許有加。這一點深富啓發性，因爲環境史被認爲蘊涵有社會改造承諾之特性，因此我認爲它的書寫對象，不應拘泥於學院，尤其是學術文章，自有其一套行之已久的規範和要求，因此環境史研究者，必須自我思考，以便在學院和社會大眾之間，作出劃分和取捨。

環境史的第三個貢獻，是在於它將「自然因素」納入研究分析中，增益了既有的史研範疇。環境史和1960年代之後的新興史學領域（婦女史、非洲美裔史、墨西哥美裔史、男女同性戀史、新社會史），都是受到政治運動的孕育而誕生。（Cronon, 1993: 2; Merchant, 1993: 1）但環境史和這些新研究的差別，就在於它論述的對象兼含「自然」的因素。對於環境史家而言，「所有的人類史的內涵具有自然成分」是領域內眾所週知的信條。至於爲何環境史會將自然的因素，納入研究？這與二十世紀以來，學術界「決定論」的當道有關。1930年代之後，史學界對文化決定論有某種偏愛，原因是對極端的環境決定論有所反動。環境決定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某些歷史和地理研究，造成影響。馬克思派學者則反對將各種決定論，視作破壞人類自由的天生性因素。環境史的貢獻，就是重新引介唯物論形式的分析法，以研究過去人類和環境的互動，以期能使決定論的理論，更爲完善。

環境史所使用的策略，就是主張須要處理人與環境的對話。（Cronon, 1993: 13）因爲無論是在文化和環境系統之間，彼此有著強烈的互動關係，也都會相互形塑和影響對方，而且沒有任何一方的系統，可以單獨的產生全面的決定性結果。因此，在研究環境變遷時，最好的方法是假設絕大多數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類行動，都具有影響環境的後果，而且自然系統內部的改變（無論是受到人類或是自然本身因素的引發），也幾乎無可避免的一樣會影響人類。這就是環境史家將「自然因素」，列入對人類活動的研究中之原因。此外，環境史家所信仰的某些信條，如：「所有的歷史都有一個自然的內涵」、「自然和文化都非靜態的」、「所有的環境知識都是來自文化的建構，而且具有歷史偶然性」，以及環境史家相信：「人類並不是製造歷史的唯一演員，其他生物、大型的自然發展程序等，一樣能夠有製造歷史的能力，而且如果任何歷史作品，忽略了這些能力對製造歷史的影響，都會產生令人遺憾的不完整」的信念等，（Cronon, 1993: 12～18）我以爲這些都是環境史家結合自然和人文信念於研究中的具體表徵。而且環境史家認爲，生態可以作爲世界史記敘的主軸。（Hughes, 1995: 1～16）[4] 相信這必然是未來世界史書寫時，不能忽視的準則。

對我而言，整體上，環境史的貢獻和特色，就是由歷史的角度，綜合當代不同學域和研究方法的分歧，以史學特有的學術特質，反覆闡述人類在不同時空中，和自然環境因素的各種互動方式，呈現環境問題的複雜性。而所有有關人類過去生活的故事，陳述著一個教訓，即：我們很難找到對人類和自然環境，兩皆蒙利的行爲，但嘗試尋找這種方式，卻又是極爲必要的。環境主義的宗旨，本在反思工業革命後，對自然環境剝削和利用的價值典範，而環境史研究成果，能夠提供訓誨，用來建議人類反省自身生活含意的必須性。故我深信：藉由歷史的研究，進而傳遞價值典範重建的訴求，可說是環境史最能發揮貢獻的地方。

三、環境史興起的原因和各發展階段的意義

4 在這一點上，最佳的例證有二：Alfred Crosby 的兩本著作（*Columbian Exchange* 及 *Ecological Imperialism*），呈現了由漸進生態觀，再論歐洲擴張的世界史觀點（其論詳如下節）；Stewart Udall 的研究則強調：過去對 1930 年代大蕭條肇因於財政不平衡的論點，至少以北美的情況來說，忽略了來自自然界的討債之意識層面。（Udall, Stewart, *The Quiet Crisi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Salt Lake City, UT: 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8〕,137～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環境史興起原因之分析

分析環境史發展的歷程之後，我認爲該領域興起的原因，可以歸納成二方面：一是主要原因，本文稱之爲近因，是指受到1960年代末環境主義之衝擊而生；二是歷史因素，本文稱之爲遠因，包括歐美在十八世紀末以來的自然主義思想，特別是十九世紀末的自然觀和先驗主義 (transcendentalism)、法國年鑒學派、美國西部史研究、以及新社會史研究等的影響。茲分別論述如下：

1 近因：環境主義

「環境史」領域之誕生，最重要的原因是爲了回應當代的環境危機，換言之，就是受到當代環境運動的發展之影響，方始孕育而生，而此一事實，特別適用於北美的情況。美國環境史家都認同此一關係（詳如上述），亦即：當1960至1970年代之際，人類開始重估造成環境破壞的工業社會之價值觀，並有改革人類和環境關係之訴求，形成了「環境主義」的思想型態；史學受其影響，而有新研究領域的發展。因此初期的環境史，不但具有道德的目的，也帶有強烈的政治承諾；但是發展日趨成熟之後，「人類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和影響的關係」，立即躍升爲主要的研究目標。

環境主義的含意，最初是主張由生態學觀念，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認爲人只是生態系中的一員，和其他物種平等；發展至今，有各種理論和派別，而且就本身的概念上，也出現新思維。[5]就歷史背景而言，環境主義的興起，和工業革命之後的價值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對近代西洋史稍

5 環境主義的論著十分豐富，茲舉數本與生態學、政治思想有關之著作爲例：Robyn Eckersley,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Warwick Fox, *Toward a Transpersonal Ecology: Developing New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ism*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1990); Peter C. List,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Belmont: Wadsworth, 1993); Robert C. Paehlk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vid Pepper, *The Root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London: Croom Helm, 1984); Timothy O'Riordan, *Environmentalism*. 2nd ed. (London: Pion, 1981) (Originally published, London: Pion, 1976)環境主義的內涵和思想分支等議題，將另文論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具基礎者，都清楚下列的發展趨勢，故我在此僅作簡要的闡述：沿襲自工業革命之後的主流思潮，相信歷史進步觀，在經濟上追求成長和發展，在自然資源的觀念上，認爲人類可以自由使用各種天賦資源，因此這種資源觀，受到「宰制式」和「剝削式」資本主義理念之操控。1950年代之後，許多新的科技產品問世，它對環境之衝擊，以污染型態爲主，Barry Commoner 在《環境的危機》書中，舉出戰後美國經濟成長最快的項目，例如：⑴不回收的汽水瓶之生產，增加53,000％；⑵合成纖維之生產，增加5,980％；⑶用於生產氯的水銀，增加3,939％。這種環境的惡化趨勢，促使西方工業先進國家，重新檢驗主導社會的價值典範；但是西方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受樂觀主義的影響，深信歷史仍將持續進步發展，因此對未來依然希望無窮，故環境問題在1950年代，還是被視爲一項科學與技術性議題；隨後才轉由經濟和政治的角度，來面對環境危機，最終形成哲學和倫理性的思考（Young, 1990:x）故總結而言，1960年代是重要的里程碑，特別是卡遜女士(Rachel Carson)的大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問世後，引起世人對生態危機的重視，而促成了當代的環境運動。我認爲這種對人類價值觀和自然生態系統關係之重新思考，不僅成了環境主義崛起的動力，也激發了史學研究的新發展。因此，環境主義是「環境史」領域興起之第一要素。基於此一特性，我堅信帶領環境運動前進的思想根源——「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是「環境史」在研究和分析時，最重要的思想依據，且因此而使環境史的本質，具有傳統史學欠缺的實踐性格，更與現世的發展關係，密不可分。

2　遠因：研究方法和觀念的啓發

⑴十九世紀以來的浪漫主義與自然觀：歐洲自十八世紀起，因爲基督教信仰式微，浪漫主義式的自然崇拜興起，法國盧梭曾以感性方式，書寫欣賞大自然與自然融合的感動，爲十九世紀的西方帶來新思潮，亦即自然人優於文明人的觀念，成爲西方人信仰上的資產。美國十九世紀的超驗主義文學運動領袖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理念，使歐美的自然信仰，更爲普遍化。影響所及，帶起了對自然的抒寫風潮，以及敬愛的心理。這種影響在英國，促進了自然史的研究；在美國則是自然資源保育運動(Conserv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vement)的思想根源。例如：Alexander Wilson寫作自然之美，出版美洲鳥類研究，引起各界興趣；John James Audubon 出版《美洲之鳥》(*The Birds of America*)，刊出鳥類和其棲息地，介紹自然之美，深入人心。其後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撰寫膾炙人口的《湖濱散記》，以紐英格蘭的Walden Pond爲對象，影響美國人的自然觀甚大。

⑵法國年鑒學派：法國學者布勞岱針對菲力普二世時期地中海地區的環境，進行長時間的歷史研究，在方法上，先討論人和環境的關係，再擴及社會史層面之研究（包括人類社群和經濟制度、國家、社會，以及文明、戰爭等之關係史）；最後則以傳統的個別史（諸如研究社會動盪等事件）爲研究主題。整體而論，他的重心是研究「自然」在形塑地中海地區人群的行爲、文化和社會的重要性，而且特別強調自然對地方文化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反過來對國家社會發生的作用。雖然布勞岱並未稱自己的研究是環境史，但是他所使用的長時間的社會史研究法，則對當代環境史的研究，有借鏡和啓發的功能。

⑶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美國西部開發史的研究。二位重要的史學家爲環境史研究，注入新觀點。一位是Walter Prescott Webb，另一位是 James Malin。Webb主張環境決定論，Malin則是將研究法帶進生態學理論的領域；而此二學者受到Turner學派的影響甚大（詳於下一節）。[6]

⑷1960年代之後的新社會史研究：該研究將對象由政治菁英，轉成一般社會階層（勞工、夫妻、貧民及其他），這種「由下而上」的研究法，突破傳統歷史研究的範疇。因此使得以「地球生態」爲目標的環境史研究，得到鼓勵。環境史利用「草根」研究法，以「地方史」爲新領域的基床，探討區域內的人群、勞動組織、以及人群在各地遷移等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由Donald Worster對中西部的研究、William Cronon對紐英格蘭地區的研究中（詳見書目），窺見端倪。早期這種對於人與地方互有關連性的觀點，於1990年代末期，成爲促進生物區域主義之源發種子。（Miller & Rothman, 1997: xii-xiii; McGinnis, 1999）

6 相關討論，可以參考John Opie對該派研究對環境史影響的討論(Opie, 1981: 79～91)；Michael J. Brodhead, "James C. Malin, 1983-1979," *Environmental Review* 4, no.1(1980): 18～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各發展階段之劃分與意義之探討

誠如某些論說指出，關懷自然環境和社會關係的研究，在美國學界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但具有當代環境史含義的領域，則被認爲是興起於1960年代末期，而正式組成學術團體，是在1970年代初期。當本文作者進行北美當代環境史的文獻分析時，發現並沒有任何的學術論文，討論其整體的發展歷程。因此擬在此處，依其時間和性質，試行區分美國的環境史之歷程爲三大階段，並擬對各階段的理論和發展上的重要性，略加論述，目的希望能有利讀者對此領域發展之了解。此三階段分別是：「萌芽期」（1960年之前）；「確立期」（1960至1986年）；[7]「理論建構期」（1987年至今）。

1　第一階段：環境史研究的「萌芽期」（1960 年之前）

我認爲它的整體發展，最主要是環繞在「自然生態」因素如何對環境史產生啓發的主軸上。初期的成員以研究美國西部的史學家爲主，特別著名者是Walter Prescott Webb和James C. Malin，尤其是James C. Malin，因爲他在1920年代、1930年代時，就已利用生態學理論，作爲探究北美大草原史的依據，著作等身，有史家將他視爲當代環境史的奠基者，但他自己卻不稱自己之作，是生態史。（White, 1985: 297）然而也有史家認爲上述二位史家的研究，有其侷限性，而且也都被看作是社會達爾文派。（Worster, 1984:1～4; Miller & Rothman, 1997: xii）原因如下：他們皆生長於美國中西部大平原區，雖然研究上，各有不同的觀點，但本質上十分近似，因爲他們成長的時代，仍以農業墾殖爲主；而在學術上，他們都是接受美國邊疆學派(Turnerian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之教育訓練。我個人則相當肯定這二人的先驅貢獻。

約略同一時期，德國史家Karl Wittfogel在理論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7　依據的理由有三：一、環境史理論的正式成爲探討專題，出現在 1987 年；二、環境主義的理念，在這一年，被世界組織確立爲「永續發展」（見聯合國的文書《我們的共同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三、Donald Worster 的著作《天涯海角》（*The Ends of the Earth*），結集 1987 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並附有理論和研究方向的探討，正式於 1988 年問世。因此 1987 年具有做爲劃分依據的指標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的理論要點，在於說明地球和人類，都是在不斷展開的辯証中持續改變著。早在1929年，他便探求有關「社會和自然界的互動，如何導致它自己的結構再建，以及如何由一個形式演進至另一個形式」的問題。而當1957年，他的最重要著作《東方專制：集權的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Study in Total Power*)問世時，立刻爲史學立下了新的里程碑，雖然亞洲學者對其觀點不儘以爲然，但他所使用的生態觀點，被美國史家確認爲對環境史研究，有重要的啓發性。（Worster,1984: 6）

此外，促進環境史和生態學日漸結合的影響因素，還包括了美國的生態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概念。以文化人類學爲例，根據Robert Netting的研究，二十世紀的文化人類學有三個階段的研究主題：⑴理念與意識型態的研究；⑵探討社會結構和組織議題；⑶研究文化系統中的生態根源。（Netting, 1977: 4）這種研究方向的轉變，點出一個重點，即：文化人類學家認爲，「環境和技術」是造成文化概念改變的基本影響力，而我們絕不能輕易的假設，人類理念的源生，僅是單純的來自於其他的理念而已。（Worster, 1984: 7）我以爲這個概念，使環境史學家又獲得了新的啓發。

此一時期，值得注意的尚有被稱爲「當代生態思想之父」的 Aldo Leopold，他在1940年代的生態論著《砂地郡曆誌》中(*A Sand County Almanac*)，將人類的思想，推向更深的層次—「土地倫理」，特別是「以山的角度思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的名言，對史家的研究觸角，特別有貢獻，我認爲這是因爲「土地倫理」的概念，引導史家超越以「人」爲主體的思考，進而將研究焦點，顧及傳統史學的空地—「自然環境」；因此，Aldo Leopold具有促進環境史向前發展之功。

總之，由美國邊疆學派理論、到德國Karl Wittfogel的生態與政治之關係、到美國生態和文化人類學的概念、以及Aldo Leopold的土地倫理觀，都是1960年代之前，促使北美環境史領域，由「生態」觀出發，以探討人與環境的歷史研究之重要因素。

2 第二階段：環境史研究的「確立期」（1960 年至 1986 年）

此時除了更加肯定生態學的重要性之外，且更進一步成立了領域的組織。在生態學觀念和史學研究的關係史上，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是不能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忽視的人與著作。一般而言，生態學對環境史發展的影響有二個方面：生態科學強調大層面的系統，以及生態學特別注重以整體性的方法，處理人類的各種現象。卡遜將自己專業的生態學研究成果，以科普的書寫形式呈現，傳遞了化學合成物對人類生態體系的重要影響，警告人類不能忽視此一嚴重後果，否則人類會在未來，面臨鳥不語花不開的寂靜春天。她的著作，立即獲得很大的迴響，曾經登上美國《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籍榜三十一週，（McCormick, 1989: 47）環保組織更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成立，卡遜因而成爲開啓當代環境主義和運動的最重要根源之一。（Fleming, 1979: 27～34）

在正式的組織「美國環境史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成立之前，有兩位重要的環境史家對此一領域，有開創之功。一位爲Samuel P. Hays，另一位是Roderick Nash。Hays的研究，開啓了環境史和政治傳統關係的研究方向，注重聯邦立法、造成環境革命的政治過程，以及政策制定等議題；Nash 則是環境思想史研究的開拓者，他的著作《荒原和美國的意念》(*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被譽爲美國文化的驅動力，這是因爲該書問世之際，正是「環境」被認爲是一個主要理念的時候，而環境的概念，又正好是他書中處理的主旨。

美國環境史研究領域的形成，不容否認的和1970年代初期的John Opie和Donald Worster二人的推動，有密切的關係。John Opie對北美環境史領域的貢獻最多，當1968到1969年，生態學對多數美國人而言，仍然被看作是新研究之際，他就主張借取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這個新興學派的理論和觀點，以作爲環境史的方法依據。

1973 年，John Opie 在德州參加一個美國研究的學術研討會時，和Donald Worster一起討論關於「匯集對環境議題有興趣學者，組織一個學術團體和研究領域」的想法；會議時間，他們邀請了密蘇里大學的 Susan Flader，和當時是德州大學研究生的Stephen J. Pyne二人，先行組成一個核心，之後再結合其他學者，在該次會議結束之後，共同討論這個構想；終於決定成立一個名爲「美國環境史學會」的學術團體。接著1974年4月，在「美國史學家組織」的集會時，有一個討論環境史教學的議程，匯集了美國相關教學者的共鳴。而環境史教學的先鋒者，就是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區授課的Roderick Nash和在耶魯大學開講的Donald Worster。基於同儕的團結和堅定的心意，大家決定共同發行一份期刊和一份較非正式的環境史通訊，《環境評論》(*Environmental Review*) 因而誕生。該刊於1990年，改名爲《環境歷史評論》（*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1996年結合另一份期刊，改名爲《環境歷史》（*Environmental History*）。初始，《環境評論》的第一任主編是 John Opie，第二任是 J. Donald Hughes (1983～1985)，第三任是 William Robbins(1986～1988)。John Opie 於1988年中，重新出任主編，並進行第一次更名的工作；1996年再度改名爲《環境歷史》後，則由Hal K. Rothman出任主編。

本期的研究發展，我認爲主要是對該領域的特性，進行思考，使之逐步穩定，因此期刊內所論述的議題，較爲廣泛和基礎性。整體觀察，僅有Alfred Crosby所探討的「生態帝國主義理論」，是惟一在此時期所產生的一個影響力最大，且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成果。它的主旨，說明生物伴隨人類的遷徙，產生交流與取代等生態衝擊的現象，結果改變了全球的生態體系；它也被稱爲是「生物旅行箱論」（portmanteau biota）。

3 第三階段可視爲「理論建構期」（1987年至今）

環境史雖然自覺擁有最新的觀點，承擔著令人興奮的「以過去的文獻創造歷史新解釋的挑戰」，但另一方面，到了1990年代初期，環境史仍還處在必須自我定義的過程中。（Merchant, 1993: 1）不過整體上，此一時期環境史的理論建構和發展，頗爲蓬勃，除了Donald Worster之外，要以William Cronon和Carolyn Merchant的貢獻最值稱述。由《環境評論》的內容，可以發現理論的探討，是1980年代後期的方向和趨勢。分析《環境評論》自創刊至今的專輯系列，可以見出理論的探討，始於1987年：

Special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Review*

Women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8:1	1984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8:3	1984
A Sampler of Courses and Programs in Environmental Studies	8:4	1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merican Ind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9:2	1985
Roots of Ecological Thought	9:4	1985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11:4	1987

Special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The Moral Sense of Nature: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15:2	1991

此外，1990年《美國史學期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登載了環境史的圓桌協商討論會，與會者有Donald Worster、William Cronon等學者，進一步深入探討環境史理論問題，在理論建構的發展上，居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上述Alfred Crosby提出的「生態帝國主義理論」外，在此特將其他三位環境史家之概念，討論如下：

(1)Donald Worster一向主張須對「生態、生產形式、理念」三者，尋找研究資源，他自己則注重生產和生態關係史—即農業生態觀和生態史（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 ecological history）的研究。他是環境史學極重要的領航人，著作豐碩，有興趣之讀者，可在本文的參考文獻中，進一步查考；

(2)William Cronon是一位繼起的重要觀念啓發者，他頗重視社會環境史（social environmental history）研究，認爲必須在不同的時空下，將種族、階級、性別和社會再生產的形式等因素，列入考量。最早的代表著作是《土地的變遷：印第安人、殖民者、與紐英格蘭的生態》(*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8]近來引發爭議和思考的著作是《不共同的基礎：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之再思考》（*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本書獲得美國學術界極大的迴響。

(3) Carolyn Merchant則是將環境史研究與女性主義合流，開拓了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的方向，她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就是《自然之

8 本書和另一本著作《自然的大都會：芝加哥與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都獲得美國學術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其理論的貢獻是在 Donald Worster 所謂的自然、生產、和意識的互動上，以及 Alfred Crosby 所謂的生態帝國主義理論上，再加上新層面的探討：即生物的和社會的再生產因素。她強調：一個地區的生態系統所產生的急劇的革命性轉變，會來自於生產和生態之間的緊張，也會來自生產和再生產之間。所產生的結果是物質上和人類意識上，一個新的自然之結構。（Merchant, 1997: 27）

以下綜合我對各家的著作和理論之研讀和整理，對上述重要理論之內涵，提出要點總結：

(1)Alfred Crosby：提出生態帝國主義論，將「環境議題」帶入全球體系研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境史概念和貢獻。

(2)Donald Worster：強調生產模式和環境互動的關係；倡導運用生態學「變動理論」（chaos theory）重要性；[9]提醒史家別在使用科學理論時，誤入過時的觀念。

(3) William Cronon 反對以「整體論」作爲研究依據；主張所有的「環境」觀念，是人類的文化建構物，因此對美國環境主義發展中的「人的位置」，有再思考的必要：該主張對環境主義的發展，有極重要的影響。

(4) Carolyn Merchant：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倡導人之一，對生態激進思想的研究，涉入頗多。

四、環境史研究的困境：兼論迷思

環境史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年歷史，但發展時，仍招致極多的艱困。本節將選擇最重要的問題—諸如：跨領域和領域溝通、對象屬性、與史學研究

9 Worster 對生態學理論之發展史，有過詳細的研究。他發現以前的觀念認爲「生態是一個平衡的系統」，但是生態學已經發展出修正的概念：認爲生態系從來都未曾平衡過，因爲持續的變動是一個基本現象，這就是所謂的「生態變動理論」。他曾在其名著《自然的經濟學》（*Nature's Economy*）一書中，據此批判所謂的「永續發展」的基礎依據，我以爲頗有見地。該書在中國大陸有譯本，是山東大學國際關係系之歷史教授侯文惠（暫譯，英譯是 Wenhui Hou），於 1993-1994 以 Rockefeller Fellow 身分，到 Worster 任教的學校（University of Kansas）訪問時，完成的譯本；惟本文作者至今尚未探查到出版社與時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自主性等，加以抒論，以呈現新領域常見之困境於一般，並將兼論某些迷思觀念對環境史研究之衝擊，提醒環境史工作者應有自我定見，以利研究之進行。

（一）史學敘事體例

以敘述文體見長的史學，在進行環境研究時，常被要求使用其他學域的理論和方法，而這正是史學和其他學域溝通的困境和挑戰。美國環境史家都承認，這種學術互通的機制，就連美國本身，亦皆十分欠缺。（Cronon, 1993: 5）簡言之，環境史的困境之一就是：它須花費相當可觀的心力，和其他領域的學者進行溝通，而這種領域互通的機制，又是一向不易建立，因此環境史家所受的挑戰很大。哈佛大學有一由校方主持的跨領域研究組織，稱之University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UCE)，刻正進行一個大型的、爲期三年的中國環境研究計畫（UCE China Project），以中國大陸北部某縣的「能源」爲研究主題，主持人包括公共衛生、法律、人類學、區域規劃等領域學者。該計畫已經完成先期的研究和問卷調查之規劃工作，原本預定於1998年11月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實際的田野工作。但就在出發前夕，因爲各領域的差異，認爲無法在問卷中，獲取各自所須的資料，於是臨時中止田野調查計畫。由於「對話」的基礎不同，故作者以前常以「寂寞的研究旅程」自況，後來在本文撰寫過程，全面進行文獻分析時，發現它竟然也是此一領域內，常見的用詞，[10]加上觀察到哈佛大學環境研究計畫實行的瓶頸，更體會此一艱困的普遍性。

（二）屬性複雜的對象

因爲環境史的跨領域特質，故和它對話的對象，除了史學界同仁和其他學術領域的學者外，還包括政策制定者和環境行動家。本質上，決策者和行動家比較關懷有效的策略和有用的故事，而且時常尋求界線清楚的英雄和惡棍的「聳動性」故事，以爲道德談資；故基於運動本質的考量，環境行動派

10 例如創刊於 1995 年，以大英國體系爲主，號稱和北美環境史期刊相輝映的另一份環境史刊物《環境與歷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在首期的編者發刊詞中，就使用了該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常易流於選擇能夠挑動情感和訴諸群眾力量的顯明議題，有時難免忽略對環境問題本質的全面性思考，我深以爲這是對史家工作倫理的一大考驗。因爲符合運動需求的動力，未見得符合好的歷史研究之要求，而環境運動實踐派的動機，卻大都希望史家能夠成爲「環境主義現實論」，二者之間必然出現限制性和疏離。此外，一般社會大眾對「歷史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常易產生錯誤的假設和羅曼蒂克的迷思，尤其是群眾的心理，期待史家能夠進行勇敢的、誇大的論述，甚至道出聳人聽聞的故事。史家對此迷思，要謹防它的衝擊，因爲環境史家長期努力的教育目的，會因這種扭曲和誤解而落空。在此議題的討論上，我個人認爲 William Cronon 的觀點精闢，[11]頗有參考價值。（Cronon, 1993: 6～7）

（三）迷思之衝擊

所謂的迷思，簡述之，是指對環境史研究的「制式思維」，大致包括三類：其一、對當代研究議題的冷漠和懷疑；其二、忽略環境主義和環境研究的關係；其三、熱情的認爲傳統的文化思想，可作爲解決環境危機之道。以下擬對此等迷思，提出個人的看法和討論。

1 對當代研究議題的冷漠和懷疑

環境史受環境主義影響，本質具有「現代性」，但在史學「法古」之研究傳統下，出現了宿命性的衝突。我在開始進行環境史研究時，由「當代台灣環境主義（運動）」的角度切入，當時就警覺二者之間的相對性，但是思及史學之本，在探求古今之變，且堅信當代環境運動和危機，是「今之巨變」，是史學必須處理的議題，因此史學研究的精神，不離「延續與變遷」的軸線，就成了我對「自我」和「他眾」合理化環境史研究的基本動力。事

11 1997年9月，聯合報文教基金會選擇花蓮，召開「守望東台灣」的研討會，會中的二個現象，可以作爲一個證明：一、在會中環保團體成員和與會的大眾對於海岸和景觀問題的討論，很有共鳴，但是對於花蓮衛生下水道與水域污染這類「看不見」的議題，似乎比較缺乏關懷；二、第二天進行一場比較傾向歷史性議題的討論時，聽眾的反應相對冷落。這可以說明社會運動、群眾性質與史學研究之間，可能具有本質上的距離，值得未來台灣學界進行環境史研究時，加以注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上這是學術資歷淺顯的歷史工作者，在進行環境史研究時的困境，而其根源，質言之，正是來自於史學傳統的迷思。作者刻正在美國哈佛大學進修，常有機會和人類學、政治學等領域的學者，進行討論，他們都十分稱許美國環境史的學術貢獻；國科會新近成立的「永續發展委員會」，正式將「環境史」列爲研究補助的項目。若由史學法古的傳統思考，環境史領域，出現這種外界肯定，同儕質疑的矛盾現象，就可以理解了。

今日經由環境史的研究，已經得證科學知識可以扭變觀念，並且改變政府對自然環境重要的政策和慣例，Thomas R. Dunlap的研究，正是此一論點的重要研究佐證（Dunlap, 1983: 54～70）傳統史學家所承當的士階層的角色，與今日作爲社會的知識份子，在公共領域上的參與，其功能與角色實有差異；此時，史學家是否應該對我們在當代社會的變遷中，在政策制定的參與程度上，有所反省？傳統知識份子「民胞物與和經世致用」的使命，是否仍須傳承？今日是否仍應秉持重古輕今之習，而質疑環境史的「現代性與合理性」，進而拒（懼）斥之？當代議題是否也因此而理當被推入社會學的領域？史學和社會學之別，應該不在於問題屬性的古與今之別，而應該取決於研究方法的差異。基於太史公「通古今之變」之訓，我認爲史家不但不能將現代環境研究，輕易拱手的謙讓於社會學家，反而應該以積極的態度涉入，貢獻史學重視時空延續與變遷的縱深特性，因爲環境危機的議題，絕不是過去人類曾經有過的經驗，它絕對是當代政治、社會、經濟、思想等層面的「新變局」，它最須要史家以綜合的能力，觀照過去，以作未來之鑒。在這一點上，我不以爲史家有妄自菲薄的權力。

2　忽略環境主義和環境研究之間的必然關係

本質上，由美國環境史領域之興起歷程，可以體認環境史和環境主義的密切關係。因此環境史家都很清楚，在進行研究時，對當代環境主義的主張，容或不必是一位認同者或行動者，但絕對有必要了解它的內涵。縱然不是環境史家，對這一點，也都有基本的認知。但我以爲這在台灣學術領域中，二者的相關性，並不如西方學界的明確。[12]許多學門的研究者，以從事

12　作者曾經以「環境主義」作爲一篇論文分析架構的參考，有一位評論人玩笑的說：「我不懂什麼是環境主義，我只知道三民主義」。或許他只想凸顯評論的幽默，但事實上卻也反映出一般研究者對此議題的類似觀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環境研究自居，但卻缺乏對環境主義的基本認識，這種現象，值得思索。但以環境史的角度而言，則不應受其影響，忽略環境主義和環境史的根本性關係，否則如何合理化所進行的研究，就是當代環境史領域之一環？

3 重視以文化思想作爲解決環境危機之道

強調以文化思想作爲解決環境危機之道的情懷，而忽略了當代環境議題的政治和經濟性，我以爲其弊在容易流於文化自珍或文化對立的兩極心態。自古以來，東方信仰和新儒家，都有天人合一思想的傳統，是環境主義訴求人類更改工業與資本主義價值典範下，一個極爲重要的思想資產。但是重視人與天的和諧關係之文化，事實上並不是東方文化的專利，挪威的文化和印第安族的文化，一樣重視和自然的和諧關係。[13]再者，工業社會之經濟、政治等結構，實與農業社會迥異，因此思想是否能夠在不相同的社會與政經的環境下，獲得實踐，實涉及更多層面的配合。是以，由於未能整體的、且積極的審視當代環境問題的特性，而致出現對自我傳統文化之樂觀期待，或是仇視西方先進國家以「環境帝國主義」待我的兩極現象，這都是環境研究中的文化迷思；因此，在研究上，應謹慎看待文化因素的潛在可能和限制。

五、新方向的形成與未來的發展：代結語

我所觀察到的西方環境史研究的新趨勢，就是一個「史學和當代議題」高度配合的最佳例證。例如：重新思考「都會和種族議題」在環境史研究中的新方向，基本上，這是對十九世紀以來，縱橫美國環境史的最大核心—「資源保育議題」發展極致之後的新思考。「都會議題派」強調不能只專注於「荒原」（wilderness）和自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的保育議題，而忽略了人的地位，特別是都會公害問題對人權的侵犯（例如毒性化學廠的污染和核能場址的選擇等等），已經十分明顯和嚴重，其重要性，絕不下於「人對自然環境的保育」課題，因此它的研究，也和新發展的「環境正義運動」(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發生極爲密切的關係。都會議題

13 當代環境主義中的深度生態學(deep ecology），就是源自挪威的文化根源，將此概念普世化的挪威學者 Arne Naess，論述其思想的啓發，來自挪威人的自然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派的研究先驅者，有 Jeol Tarr、Christine Rosen、Harold Platt、Craig Colten，而以William Cronon總其成；和種族有關的環境正義運動議題，則可以Martin J. Melosi爲代表。

另一個我認爲不能忽略，又與亞洲環境問題極有關連的新發展，就是1990年代末期，「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研究的興起；而它的發展，當然和全球化的趨勢，密不可分，在Michael Vincent McGinns主編此一主題的新作中，就直指這個關係的相互性。（McGinns, 1999）我發現這由當代環境運動的發展史中，就可以獲得證明。因爲十來年全球環境變遷議題所受到的重視，以及在1992年巴西里約的第二屆世界環境高峰會召開之後，世界各國尋求以「國際合作」的方式，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環境問題之訴求，是頗爲明顯的發展趨勢。但是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卻又不能以「統一」的方式對待，故獨特的區域和地方之環境特質與現象，立即成爲國際環境政策的先決基礎，因而相關的區域生態研究，便自然成爲研究的新焦點。這個研究的意義，我認爲有二個。第一，它的本質和「土地」有根源性的關連，它對各國建立土地和環境的認同意識與尊嚴上，極有幫助，而且更有利於爭取後開發國在國際的環境發言權；[14]第二，分辨區域的環境特質，可以提供正確的政策參考，以中國大陸爲例，區域的差異性極大，不能以單一整體視之；台灣地區的東、西部，在開發政策和自然環境特質上一甚至是環境保護團體的運動模式和意識型態上，也有很大的差別，（曾華璧，1998）所以「生物區域主義」之理論和運用，十分重要。我個人相信，這將是二十一世紀各國環境史家，可以發揮所學和貢獻的一個研究方向。

環境史美國有許多大學開授環境史課程，例如著名的耶魯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等；其他環境研究的課程，也常將「環境史」的概念，作爲導論的閱讀資料，例如哈佛大學人類學系Pauline E. Peters教授的課程：「環境與環境主義：人類學觀點」(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ism: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s)，就選列了Donald Worster和William Cronon的文

14 哈佛訪問學人黃萬盛教授和作者進行討論時，曾表示亞洲國家應該爭取區域環境議題的發言權；我認爲只有透過對自我區域環境的完整研究和認識，才能達到這個目的。環境史正可以在此一目標上，發揮貢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章。前述國科會的永續發展委員會自今年度（1999年）起，已將「環境史」列爲研究補助的學門，說明「環境史」已經具有不容否認的學術地位。美國環境史發展之初，Donald Worster 曾經有此譬喻，他說：環境史好像新移民，膚色、語言和生活習慣，與既有的住民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難被認同。相對於此，台灣的史學界是否可能接受此一新移民呢？1980年，《思與言》首度登載「環境社會學領域」的文字，（蕭新煌，1980）開啓國內社會學研究的新頁；今日展讀，似仍聞其期待之聲。相較於此，史學仍有漫長之路，留待前進。

前述環境史「跨領域研究」的性質，是造成了它的困境原因之一，因爲它的挑戰和有待妥善統合的對象，來自各方。正是因爲如此，故研究者須要有耐心和恆心，要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其他領域的知識洗禮，並擴大研究的關懷面—由人類社會擴及自然環境。更有甚者，來自不同領域學者的嚴厲批判，是一必須勇於面對的挑戰，因此更要有堅韌的意志，才能培養信心，持續前進。William Cronon在討論跨領域研究的困境時，曾經提出一個極令我同感的觀察，他說：「所以我們（進行環境史研究時）會面臨的困難是—特別是對年青的學者而言：當我們正嘗試在新領域內建立基礎時，因爲無人能夠充分的體識我們工作的成績，所以我們會發現自己棲息在一個很受刺激的學術空間中。」（Cronon, 1993: 5）但我認爲這就是環境史的特殊性，也是想從事此一研究者，必須接受的、無可逃避之挑戰。因爲正如同我們閱讀其他領域的研究時，對缺乏歷史意識的橫切點式的觀察和論述，不也一樣感到不滿足，不也一樣會因期待的落空，而給予批判嗎？因此我個人以爲，耐心、恆心、開放的心，以及堅強的意志和信心，是從事環境史研究的必要心態。

反省自己從事所謂的環境史研究，歷經十餘年，才算有「初進門檻」之感，但距離結合史學、人文和自然的環境史研究目標，仍有遙遠之路。在此願以野人獻曝之心，簡要介紹其他幾本必備的書目，藉以分享，並期待更多同好之參與。首先，除了前述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之外，由於此研究和生態學有密切關係，因此研究者，第一必須對生態學有初步的認識。我建議初入領域者，可以選擇一本兼含社會與文化思維的生態學著作入門，Malcolm L. Hunter, Jr. 所著的 *Fundamental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Blackwel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cience, 1996)一書，淺易可讀，值得參考。在科學領域中，有一門年青的新興學術，稱作「資源保育生物學」(Conservation Biology)。此一學門也是一支跨領域的新研究，關懷人類的社會環境，它的主題超越生物學，旁及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也論及法律和教育，目的希望透過人文社會學科的精神，以利實踐資源保育。它是1978年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舉行第一屆的「國際資源保育生物學會議」之後，才孕育而生。1987年，資源保育生物學會正式成立，並發行新期刊《資源保育生物學》(*Conservation Biology*)。（Hunter, 1996: 14～15）Hunter的著作，就是此一領域之作品。第二、對當代環境議題的內容，須要有所認識，如此才能掌握環境問題，並且有較爲宏觀的視野。這個主題可以選擇的書籍很多，我推薦由Nick Middleton的著作入手—《全球俱樂部：環境議題導論》(*The Global Casino: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Edward Arnorld, 1995])，因爲該書用詞簡易，並且包括最新的環境主題—「永續發展」；全書的主旨，兼顧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以及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各種影響方式等二個層面，因此它的討論，涵蓋物理環境的作用和造成環境問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的結構，不但符合環境史的需求，又能捕捉新趨勢。第三，環境史大師Donald Worster 討論生態理論演進的著作：《自然的經濟學：生態觀念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更是環境史入門不能不讀之作。該書於 1977 年由「山岳協會」(Sierra Club)初版，1985 年則改由 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出版，至今已重印多次，可以稱爲本領域的經典。

在環境史研究領域的發展過程中，清晰的顯現了史學中「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的衝突，以及「現代」和「傳統」的對立。事實上，環境史在創始之初，就堅持史學訓練是此一研究的第一要件，雖然引用科學的知識和概念，卻仍以詮釋人類的歷史發展爲職志，從未企圖以神奇之貌，另闢蹊徑。細究美國環境史發展的根源與過程，我認爲該領域的本質，在發揮史學之長，以新知識—生態學，作爲分析和詮釋舊文獻的參考依據，並試圖彌補當時學術界當道的「決定論」之偏頗，因此在我的評估上，它懷有「創造轉化」的學術目的。

轉化的發展中，存有一些猶待深層思考的問題。在方法論上，因爲它向自然科學借取觀念，故必然隱含著某些特定的危險，特別是因爲注重自然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境因素的角色，使史家常以戒慎之心，謹防犯了強將生物決定論的型態，加諸於人類歷史之弊，更因而否定了人類的獨特性，甚至無法廓清人類物種和其他生物之間的差異。在此一問題特性上，John Opie認爲這是環境史家必須搏鬥的一個問題—亦即：史家如何以生物或生態的觀點處理歷史問題，而不否定人類在型塑自己歷史之時，自身角色的獨立性、自由性和獨特性。（John Opie, 1982）作者同意這是史家處理環境議題時，必須嚴肅思考，拿捏分寸的大問題。但進一步思考，將人文的研究和科學結合，無疑的是一種重要的創造和轉化，是主動性的發展，值得肯定；但是由於自然科學知識的演進，並不是人類能夠預期者，因此我們不但不可以利用錯誤的理論—這是Worster的警告，我也憂慮：倘若我們隨著科學新知之演變，而不斷改變史學的詮釋依據，這會不會使我們喪失了作爲詮釋人類行爲主體學科的合理性？Cronon提出環境史作爲一種故事的敘事體時，應該重視「敘事的強制規範」（narrative constraints），即：(1)故事不能抵觸過去已知的事實；(2)故事必須具有生態的意義；(3)史家是以社會成員的立場書寫故事，所以我們不能在進行工作之際，不考慮社會群體的因素。（Cronon, 1992: 1372～1373）這種觀點，事實上已對上述的思考，作出指引；但是將科學新知運用在古史的詮釋時，若一旦真和敘事的強制規範之間，出現對立，則環境史家該如何應對？我認爲環境史的理論，或許仍須在這一點上，再作思索。

當環境主義在1960年代末興起之初，它的重要性並非十分凸顯，例如Frederick M. Watkins和Issac Kraminck所撰的《意識型態的時代》(*Age of Ideology: Political Thought, 1750 to the Present*)一書，出版於1964年，探討西方的政治思想，書中內容，對環境主義，未置一詞。到了1989年，Robert C. Paehlke的專著《環境主義與進步政治的未來》(*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gressive Politics*)問世時，環境主義已經被認爲是一種根源於自然科學的意識型態，其發展的情況，不但可以與一世紀以前社會主義的發展狀況相比擬，並被認爲人們對政治世界的認識，也因它而改變了。（Paehlke, 1989: 273）「環境主義將伴隨人類走進二十一世紀，且將是一個最重要的議題」的思想，更是各界所共認的特色。根據我的觀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以來，許多新概念的加速形成，說明「後環境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post-environmental studies)的時代，已經到來了。[15] 這些概念，包括：由「持續的成長觀」（continuous growth）進入「永續發展觀」（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思考和政治實踐；由生態學的平衡論，演進爲變動理論（chaos theory）；兼含科學、人文、社會科學觀念的「資源保育生物學」之崛起（如前所述），在在顯示了科學領域的質變，與國際社會的回應；環境主義自發展之初，至1990年代上半期，本身也出現了修正的思維，尤其認爲「環境概念是人類文化的反射」，提出「再思考人在自然地位」的必要性等；此外，1996 年環境史的代表期刊（時以《環境歷史評論》爲名），在創刊二十年之後，和《森林與資源保育史》合併爲《環境歷史》，這種擴大，也意味著轉變趨勢，正在陸續進行中。所以我認爲，1990年代末期，「後環境研究」的形態，已經形成，二十一世紀或許會有一個新果誕生。

在此形勢下，預期一種包含人文學、科學、工程學、神學和社會科學等學門領域的「環境總學」，會在下一世紀成形，或者並非虛誕的想法。[16]因爲我們可以察覺，目前部份學門已經有了「轉化」；何況處理人類和環境的問題，絕不能只仰賴單一的知識，因此，此一特色，更將促進這種綜合式的發展，有更高的可能性。不過我的關切，並不在於它是否會在何時形成，或是以何種型態和名稱成立；我認爲環境史應該關切的重點是：如果「環境總學」已經在發展中，而且極有可能實現時，做爲研究人與環境互動歷史的人文學科，環境史如何能夠在目前的基礎上，以積極的態度，促使理論和觀點的圓融和成熟，以便在未來「新學」成立時，發揮史家最大的貢獻，方是當務之急。本文撰寫的動機，原本旨在證明當代環境史領域的形成和發展，是一不容忽視之事實；但行文至此，反倒是深切的認爲，環境史是否被承認爲

15 該詞借用 Daniel Bell「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觀念中的「後」的意含，即指目前正處於異於前一時期的變動的過程，但轉型尚在進行中，還未達到最後演變的終點，故稱之。

16 燕京訪問學人陳昭瑛教授曾經提問，是否有可能發展一個新的環境研究領域，可以包括環境史，使它避免傳統研究的束縛？經仔細審視相關研究後，發現受環境主義的影響，已經有許多新研究枝系緣自傳統領域而誕生，例如具有應用性的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或稱環境哲學（Environmental Philosophy），就是哲學領域的新發展。故未來統合性的環境研究之形成，有其可能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研究的範疇，根本已經超越須要辯証的層次；與其消極的等候被接納，不如積極開拓。目前最令我期待和關懷的的目標，毋寧是：「做爲區域的環境史研究者，如何在全球化的形勢下，與人類的環境危機議題中，本著史學的素養，以草根的研究方式，進行鄉土和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以經世致用的精神，豐富環境史的成果，做出積極和有意義的貢獻」。以此自勉，並做結語。

1999年初春，完稿於美國劍橋・哈佛大學

徵引書目

（一）中文論著

曾華璧，《守護山海的足跡：花蓮地區環境主義之論析與前瞻》，台北：亞太，1998

劉翠溶、伊懋可（Mark Elvin）合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中研院經濟所，1995

蕭新煌，〈社會學與「環境：環境社會學的基本看法」〉，《思與言》，18卷2期，1980年7月，127～136

（二）英文

1 基本期刊

Environmental Review (1976～1989)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90～1995)

Environmental History (1996～1998)

2 論著

Bailes, Kendall E.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Bird, Elizabeth Ann 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Review* 11, no.4 (1987): 255～2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rnon, William,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 "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 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A Roundtable: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no. 4 (March 1990): 1122～1131

————,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Y.: Norton, 1991

————,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no. 4 (March 1992): 1347～1373

————,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no. 3 (1993): 1～22

————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N. Y. & London: Norton, 1996

Crosby, Alfred W.,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2

————,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Dunlap, Thomas R., "'The Coyote Itself'-Ecologists and the Value of Predators, 1900-1972," *Environmental Review* 7, no. 1 (1983): 54～70

Gottlieb, Roger S.,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N.Y. & London: Routledge, 1997

Flaming, Donald., "Roots of the New Conservation Movement," *Perspectives of American History* 6, no. 7 (1972) : 91

Hughes, J. Donald., "Charivari for an Editor," *Environmental Review* 7, no. 1, (1983): 3～4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as Narrative Themes of World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 no. 1 (1995) : 1～16

Hunter, Malcolm L. Jr., *Fundamental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Blackwell Science, Inc., 1996

Jacob, Wilbur, "Frontiersmen, Fur Traders, and Other Varmints: An Ecological Appraisal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sletter of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70

Leibhardt, Barbara, "Interpretation and Casual Analysis: 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12, no. 1 (1988): 23～36

McCormick, John, *Reclaiming Paradis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P., 1989

McEvoy, Arthur F., "Toward an Interactive of Nature and Culture: Ecology, Produc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California Fishing Industry," *Environmental Review* 11, no. 4 (1987): 289～305

McGinnis, Michael Vincent, *Bioregionalism* ,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9

Merchant, Carolyn,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0

————,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Revolutions," *Environmental Review* 11, no. 4 (1987): 265～274

————, *Ecological Revolution: Nature, Gender, and Science in New England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 ed.,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xington, MA: D.C. Heatg and Company, 1993

Middleton, Nick, *The Global Casino: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London, N.Y., Sydney, & Auckland: Edward Arnold, 1995

Miller, Char & Hal Rothman eds., *Out of the Woods: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7

Nash, Roderick 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1 (1972): 362～369

————, *Wilderness and American Mind*, 3rd ed. New Hav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st ed. in 1967

————, *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Readings in Conservation History*, N.Y.: McGraw-Hill, 1990

Netting, Robert,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nho Park, California, 1977

Opie, John,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Old W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Mythology," *Environmental Review* 5, no.2 (1981): 79～91

————,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Review* 7 (Spring 1983): 8～16

O'Riordan, Timothy, *Environmentalism*. 2nd ed., London: Pion, 1981, Originally published, London: Pion, 1976

Paehlke, Robert C.,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etulla, Joseph M.,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an Francisco: Boyd and Fraser, 1976

————,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n Search of a Methodology," *Environmental Review* 2 (1977): 14～43

Seroos, Marvin S., "The International Comm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nvironmental Review* 12, no.1 (1998): 1～22

Udall, Stewart, *The Quiet Crisi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Salt Lake City, U. T.: 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8

Werskel, Timothy C., "Agents of Empire: 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Imperialism," *Env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nmental Review 11, no. 4 (1987): 275～288

White, Richard,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4, no. 3 (1985): 297～335.

Worster, Donald e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The Formative Period, 1860-1915*, New York: Wiley, 1973

————, "World without Borders: The Internationalizing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6, no. 2 (1982): 8～13. Also in Kendall E. Bailes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661～669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3 (1984): 1～19

————, "The Vunlnerable Earth: Toward A Planetary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11, no. 2 (1987): 87～104

————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print in 1989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1988, 289～307

———— et al., "A Roundtable: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no. 4 (1990): 1087～1147

————,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Young, John, *Post Environmentalism*,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0

Young, Robert, *Darwin's Metaphor: Nature's Place in Victorian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責任編輯：孫慧敏　　校對：邵雅玲、陳怡宏、郭沛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velopments, Meanings and Myth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Case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Tseng, Hua-pi

Abstract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he 1960's in North America was influenced by environmentalism's emergence during that period. On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s key characteristics is the marriage of ecology and history. Applying a new ideology to conventional methodology,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try to interpret how human behaviors inte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scipline, this paper highlights environmental history's developments, meanings and myths, and discusses the field's major theories and contributions. Also addressed here are environmental history's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 new transdisciplinary field, Taiwan academics should grant it full recognition as an area of scholarly inquiry.

Keywords: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environmental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